

我所了解的“文明的冲突”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倪世雄

《文明的冲突》一文是美国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教授主持的“变化中的安全环境与美国国家利益”研究项目的直接成果。我第一次听到他阐述这观点是1993年2月在卢森堡举行的以“东西方格局结束后的世界体系”为主题的一次国际讨论会上。亨廷顿教授在会议的第二天上午作了25分钟的基调发言，题目就是《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教授认为，从历史演变来看，17世纪以前是王室之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后才出现国家之间的冲突，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集中反映了世界民主力量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冲突，二次大战以后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东方西对抗。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今后世界上的冲突将主要不是政治的，甚至不是经济的，而将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他指出，文明的冲突是指文化、宗教、民族和种族的冲突，是一种广义的界定。他进而言之，冷战后文明的冲突集中为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矛盾，西方（以美国为首）仍是世界文明的重心。亨廷顿教授的发言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代表们争先恐后地评论发问，将会议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从代表们的发言来看，多数人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亨廷顿教授的观点。不少代表强调，未来世界的冲突是政治——经济的冲突，是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如，著名学者爱德华·卢德华特提出“地缘经济学”、理查德·罗斯克莱斯提出“权力协调论”、詹姆斯·罗斯诺提出“两极世界政治观”。他们都不同意文明的冲突将主宰世界政治，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现代世界冲突演变的最后阶段。他们指出，亨廷顿教授不仅将文明的冲突绝对化了，而且把世界划为八种文明，认为今后最重要的冲突将以这些不同文明的文化差异来划线也将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

我也争得了发言的机会。我认为，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为我们研究、认识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及特点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这五个层面中，后二个层面在冷战时期被忽视了，现在强调文化因素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我同意多数发言者的意见，若夸大文明之冲突为世界冲突的最后阶段并主宰全球政治，就会陷入新的认识迷宫和理论困境。对于亨廷顿教授提出的文明冲突的三种发展可能性：接受西方文明，溶合于西方文明之中，开始西方化过程；制衡西方文明，但不排斥西方文明，保存本民族传统；排斥西方文明，采取非西方化的国策，大多数尊孔或信奉佛教、伊斯兰教的国家（包括中国）就属于这种情况，我特别指出，这是西方文明独尊的表现，

他把中国列为排斥西方文明的国家也是完全错误的,是对当代中国的误解和歪曲。在这个国际论坛上,我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用12个字概括了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和立场:“不排斥,不照搬,有分析,可借鉴。”我强调说,中国改革开放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学习、借鉴、吸收国外一切对我国现代化有益的先进科技、管理经验和知识文化。我的即席发言得到与会者的欢迎。

1993年7月8日,亨廷顿教授的《文明的冲突》在《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发表,其缩写文稿又在《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发表,一时间,一场关于文明冲突的辩论就在更广的范围内掀起。与卢森堡会议上发言相比,亨廷顿教授并没有对其观点作任何修正,只是进一步作了阐述和补充。纵览全文,我觉得有两点尤其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是亨廷顿教授在谈到西方与其他国家的冲突时,特别提出了“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盟”的命题。亨廷顿教授错误地把中国视为“武器国家”,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正常关系说成“武器合作”,认为“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盟”已对“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权力提出挑战”。按照亨廷顿教授的逻辑,文明相通导致“军事合作”,中国成了“东亚多边军备竞赛”的祸因。他对中国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这一歪曲描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世界军火贸易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主要是出自国家利益,而并非是由于文明相通。中国对此一直采取慎重态度,主张建立军火市场的管理机制。相反的是,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军事合作远远超过中国。据统计,仅1992年一年,美国出售给第三世界的武器就达13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在中东地区。海湾战争后两年里,西方向中东地区出售了500亿美元的武器,其50%以上是美国出售的。如果按照亨廷顿教授的推理,美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岂不更加联系相通了吗?显然,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二是“文明冲突观”对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不可忽视。在卢森堡时,我曾问起亨廷顿教授,他的文明冲突观是否得到克林顿政府的重视。他的回答是:希望如此。在该文中,亨廷顿教授认为,文明的冲突可以“产生短期的有利影响和长期的调节作用”,为此,他提出9点具体建议:(1)加强自己文明内部的合作,特别是欧洲和北美这两大组成部分的合作;(2)把接近西方文明的东欧和拉美社会融入西方;(3)促进和保持同俄罗斯和日本的合作;(4)防止地区文明间的冲突升级为文明间的大战;(5)限制儒家和伊斯兰教国家扩大军事力量;(6)缓和西方军事能力的削减,并在东亚和东南亚保持军事优势;(7)利用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分歧和冲突;(8)支持其他文明中赞同西方价值观和利益的集团;(9)加强反映西方利益和价值观并使之合法化的国际机构,鼓励非西方国家参加这些机构。至此,亨廷顿教授把文明冲突观实实在在地提高到了政策战略的高度。由此可见,他的文明冲突观对冷战后西方国家调整对外政策必然会产生影响,尤其是为美国构筑冷战后世界新秩序提供一种新的参照框架。亨廷顿教授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和战略家,与美国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论、美苏两极均势论等重要观点曾在一定时期对美国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这次,他提出文明冲突论,另辟蹊径,先声夺人,对实施克林顿政府“经济、安全、民主”三大战略目标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明冲突论的政治性将越来越显露出来。

责任编辑 徐中振